

新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

○ 邓伟志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摘要〕孙中山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紧接着又提出了“扶助农工”“以俄为师”,派共产党人李大钊改组国民党。这实际上就是新三民主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新三民主义仍有现实意义。民生主义仍然能够成为当今缩小贫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加速器。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台湾自蔡英文掌权以来,不顾民生,用民众的血汗钱购买武器,大搞军工,遭到台湾民众抗议。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在改善民生的前提下,实现两岸统一。

〔关键词〕中国精神;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民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9.021

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迄今已有 111 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在追随孙中山,都信仰三民主义。可是,现在台湾有个别国民党要人却说不清楚三民主义是哪“三民”。还有,台湾的深绿人士竟然要淡化以至清除三民主义。他们学着陈炯明的腔调称三民主义“腐朽”。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应当花点工夫来阐明三民主义,厘清三民主义,推动海峡两岸增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意识。

一、三民主义的内容和形成过程

在鸦片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孙中山先生一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早在 1894 年 11 月 24 日也就是日本血洗旅顺

的第三天,他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如何兴中?理论应该先行。孙中山先生运用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见闻,尤其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启发他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到了“民族、民权、民生”。1906年12月2日他在东京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时,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

孙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曾这样写道:“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后来,孙中山又补充说道,“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的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的话相通。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就是民有, by the people 就是民治, for the people 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个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要振兴中华,首要的中华民族要独立,民族要平等。独立才不受欺凌,国土中的物产才能为自己所用,自己国家的人民创造的财富才能为本国人民所享用。中华民族都是炎黄的子孙,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守望相助,休戚与共。我们之间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共同。悠久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我们语言相近,习俗相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近代有人形容中华民族为“一盘散沙”,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本色。散沙的形成是由于多国入侵,威逼利诱,分化瓦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国便强行在上海设立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租界面积又一再扩大。各租界都要拉拢一批华人为他们效劳。英、法、美在侵吞中国方面目标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深藏着各种矛盾。他们强迫为他们效劳的华人各从其主。后来英、美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那也只是表面统一,内容更加复杂。这从他们的标志上可以看得出,在圆圈中央是各个国家的国旗:左上方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右上方为俄国、丹麦、意大利、葡萄牙,下方为瑞典、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的国旗。经过多国侵略者上百年的分化瓦解,中华民族怎能不被搞成一盘散沙呢?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恰是侵略者的追求。可是,令侵略者想不到的是:散沙可以做成凝聚力极强的水泥。中国人从被奴役中清醒地意识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卫国就是保家的道理,懂得只有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才能赶走侵略者。而要做到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就需要民族主义来引领。于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在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以后应该怎么办?这是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的道理。林肯提出“民治”。治理国家的人民手中没有政权如何能治?于是孙中山又同时提出了“民权主义”。孙中山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决意不照搬西方的民权,他认为西方的民权不彻底,多反复。他既不同意“天赋人权论”,也不赞成“限制人权论”,他认为民权只会是奋斗得来的。历史证明:人类社

会是从神权,经过君权,再进入民权的。他主张另辟蹊径,把政权交给人民,把治权交给政府。人民既要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还要有创制权、复决权。实行这“四权”,才是彻底的直接民权,所以他称其为全民政治。政府治理人民则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五权”是孙中山的独创。他认为实行五权宪法可以补救西方议会政治的流弊,从而构建完善的政府,唯此才能造成三民主义的新国家。他认为只要这“五加四”的九权保持平衡,就能真正解决民权问题,政治也才能走上正轨。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明确推行民权的目的和作用在于维持人类的生存。于是孙中山又同时提出了“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虽然排在第三,却是最重要的。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发现有些国家独立了,国富了,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所以他写道:“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民生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归宿和落脚点。

什么是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人民的生活”不只是指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用这些通常意义的生活,而且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它包括人民群众为获得物质生活资料而采取的谋生之道,即“国民的生计”,还包括一个社会为解决“群众的生命”和“国民的生计”而采取的措施和社会经济政策,即“社会的生存”。一个社会为解决“群众的生命”和“国民的生计”而采取的措施和社会经济政策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这三者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人民的生活”,即“民生”。“民生问题”看起来只是讲民生,可是,民生如果搞不好会引发社会动荡,社会革命。因此,民生问题说到底还是社会问题。他说:“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幸福。”

孙中山的思想是不断丰满和严密的。民族主义是前提,民权主义是保障,民生主义是基础。他在讲民生主义时,便提出了“平均地权”,辛亥革命后又提出了“节制资本”,防止垄断。孙中山之后汪精卫、蒋介石虽然违背三民主义,但在口头上、在细节上为三民主义作了些补充。马英九还提出三民主义现代化,颇有新意,可惜没有展开。

多年来,在三民主义问题上争论较大的是有没有新三民主义。

二、有没有新三民主义

近几十年,有不少文章认为不存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不存在“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重大问题。

有人认为孙中山没有说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实,其中的“扶助农工”四个大字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1月20日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上是说过的。

这一点有文字依据,毋庸置疑。更不用说,孙中山主张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很明显的是在扶农。孙中山提出“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节制资本”“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等一系列论述,很明显的是在实际上扶农又扶工。

至于“联共”,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讲话中没有讲过。不过,早在“一大”召开前的1923年10月,孙中山就指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筹备“一大”。李大钊是什么人?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孙中山派共产党人李大钊去改组国民党,去筹备“一大”,这是不是“联共”呢?在到会的165位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二十四人,占七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又指定李大钊参加主席团。国民党开会,要共产党人上主席台,这又说明什么?大会还请共产党人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在“一大”选出的41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孙中山还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跨入国民党,他安排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是不是实实在在地在“联共”呢?

至于“联俄”,那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在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观察、比较、分析之后,提出了“今日之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孙中山在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后,得出结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他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国民党“一大”。“联”,平等结合谓之“联”,他已经以俄为“师”了,岂不是更高层次的“联”吗?孙中山、蒋介石为办黄埔军校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这不是实实在在的“联俄”吗?

行动是受思想指导的,孙中山在“联俄”方面有这么多重大举措,还会没有“联俄”的理念吗?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孙中山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对苏俄这般平等待我平等之民族孙中山还会不联合吗?

有人说,“三大政策”是中共在1940年概括出来的,意思是中共杜撰的。是不是杜撰的?请听一听宋庆龄的说法。孙中山在开过国民党“一大”后不久就病重了。他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宋庆龄写道:“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2]一个月以后宋庆龄又在去苏联前发表声明,庄严指出:“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3]直到1962年,宋庆龄仍然坚持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说法。她写道:“孙

中山在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4]宋庆龄从1927年就开始讲“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有目共睹，怎么能讲是1940年才出现的？

还有人说，三大政策不能代表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只是“政策”，并非“主义”。这话听起来有部分道理。可是这话是把不可分割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割裂了开来。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平等，民族独立。联俄不正是民族平等的体现吗？孙中山那样三番五次地为农工呐喊，不恰好说明他已经找到了民权、民生的关键吗？在20世纪20年代谁最没有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生存权？是农工！扶助农工才是牵住了民权、民生的牛鼻子。

至于有人认为，提“新三民主义”就是对三民主义的否定，“是中共出于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而强戴给三民主义的一顶不合身的帽子。”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新高度，自然可以称得上“新三民主义”。“新”并不全盘否定“旧”。新是对旧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继承和发展了“民有、民治、民享”，并没有全盘否定“民有、民治、民享”。求新恰是孙中山的意愿。孙中山在谈到国民党“一大”及其宣言时，指出：“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5]连续三个“重新”，难道不会“出新”吗？没有明确讲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有生命力的，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事业和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从没有抛弃过“三民主义”，而是把它吸收到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体系当中。毛泽东多次赞颂孙中山，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主张”。为了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早就从自己的指导思想体系中将容易为世界所接受的“三民主义”思想抽出来，用之以外交、内政和价值体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一直在悉心研究。中共“十五大”坚持认为孙中山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三、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

三民主义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111年后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腐朽”。

（一）民族主义是反对分裂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人要有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什么？在今天，已不再是“五族共和”，而是咱们56个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咱们56个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台湾的布农人认为他们与贵州省的布依族本为一个民族，2017年两岸的少数民族同胞又在贵州齐聚一堂，围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交流座谈，表明他

们是同根同祖。以前还有观点认为,苗族、瑶族、畲族三个民族也是本为一个民族,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说得广一点,我们 56 个民族都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现在有人闹这个“独”,那个“独”,不是顺乎世界潮流的。欧洲几十个独立的国家,还要组成“欧共体”“欧元区”,我们早已成为一国的中国为什么还要分裂呢?大国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和互补的空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世博会闭幕式上,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在他三分钟的致辞中大谈“中国人要办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他会后为他这句话解释说:“中国人每人拿出一块钱,就是 13 亿。还有什么事办不成?每人拿出两块钱也不算什么,26 亿可是个‘大数据’啊!”合则两利,分则两伤。闹独立只会是对“国王”的加冕有利,对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今天强调民族主义仍有现实针对性,有助于推动和提升我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

(二)民权主义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旗。我们一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可是在政治生活中有些地方就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所描写的那样,官员无视人民的权利,大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权大于法,鱼肉百姓。政务不透明,不给人民知情权;把百姓拒之门外,不给人民参与权;封锁消息,隐恶扬善,是不给人民监督权。民权是廉政、勤政的催化剂。兑现民权主义的路还很长。今天适当宣传民权主义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三)民生主义是缩小当今贫富差距的加速器。中国富强了,可是由于有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地位,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得很大。不论是按基尼系数计算,还是按“五分法”“十分法”计算,中国的贫富差距都超过了警戒线,接近了危险点。“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许没有,“朱门酒肉臭”“豪门钱发霉”的事层出不穷。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加大社会张力,激化社会冲突,导致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发病率以及群体性事件上升。面对这般严酷的现实,在中国大有倡导民生主义的必要。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和谐、文明的物质前提。

(四)用“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这边实行社会主义,海峡那边实行三民主义。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迟早会统一。从理念和信仰上讲,拿什么来统一中国?说法不一。不期然而然,孙中山先生早就为我们指出了两岸的结合部。他在 1924 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换言之,社会主义包含民生主义。1940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战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可见,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甚至还有合二而一之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期,更应当弘扬三民主义。中共领导人有一句名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奋斗的

目标。”把这句名言简化一下,就是:民生是目标。显而易见,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在目标上,即在民生问题上有一致的地方。目标一致,是两岸统一的前提。为了消除两岸统一的障碍,建议两岸共同接受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一而二,二而一。简而言之,在信仰上,我们要用“民生理论统一中国”。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差异是绝对的。正因为有差异,我们两岸的人都爱谈“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孙中山和毛泽东两位伟人早就为我们点出了“同”,化掉了某些“异”,找到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和结合部。孙中山还流露过“师马克思之意”^[7]。既然都称“师”了,这表明三民主义也有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二者之间在基本理论上定有相通之处。

和为贵,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赶快统一呢?炎黄子孙早就应当在“共同点”肩并肩,在“结合部”手拉手,在“相通之处”大显身手了。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前有孙中山、毛泽东,也一度包括蒋介石他们 1924 年的“二四共识”,今有 1992 年 11 月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共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人民盼望已久的大统一指日可待。

注释:

[1]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五件》(之二),《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为抗议孙中山的葛敏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3]《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4]《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9页。

[5]《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3页。

[6]《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43页。

[7]《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2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